



制图/罗乐

百年征程 启航新征程

寻找最后的川籍女红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在党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长征途中的女红军,是一个特殊而伟大的群体,她们理想信念坚定、英勇顽强。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党史研究专家后获悉: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共约8000人,其中90%以上为川籍女红军。其中,60岁走长征路的藏族女红军杨金莲、长征路上8岁女童苏力、带领一家9口参加长征的王理诗等川籍女红军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特别值得铭记和弘扬。

早在2020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经过史料收集与缜密考证,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时,女红军仅存70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女红军仅余400余人。而长征途中的

川籍女红军,绝大部分已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流落失散于各地。截至2021年5月20日,健在的川籍女红军,仅剩7人。

她们分别是——

赵桂英,104岁,四川苍溪人,目前居住在内江。

张文,101岁,四川通江人,目前居住在北京。

王新兰,96岁,四川宣汉人,目前居住在北京。

苏力,92岁,四川青川人,目前居住在上海。

万曼琳,94岁,四川南江人,目前居住在西安。

王全英,99岁,四川金川人,目前居住在都江堰。

王少连,100岁,四川巴中人,目前居住在巴中。

2020年6月至7月,经不懈努力与多方沟通协调,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特别报道组在成都、都江堰、重庆、内江、北京等地分别对其中五位健在川籍女红军进行了采访,拍摄图片、视频,记录下她们珍贵的影像资料。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荣耀永恒,传奇在延续。长征时期,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顽强斗争。川籍女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值得后人永远铭记。“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希望通过川籍女红军的感人故事重温长征历史,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努力谱写新长征路上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今天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陆续推出《我的长征 寻找最后的川籍女红军》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专访四川省党校教授王友平: 长征路上,川籍女红军人数最多贡献巨大



人物简介 王友平

王友平,四川内江人,四川省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期刊社副社长(原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工作。

说起长征路上的川籍女红军,四川省党校、四川行政学院期刊社副社长王友平如数家珍。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党校教员,研究和宣传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

王友平对红军长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年前。他说:“当时,我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红军长征的文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第一战》。”

2015年,王友平接受了一次媒体关于长征女红军的专题采访。之后,他在进一步梳理关于长征川籍女红军的史料后发现:在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川籍女红军占了绝大部分,并有单独的军事建制,“她们理想信念坚定,英勇顽强,大部分壮烈牺牲或流落失散于各地。后来,在长征路上活下来的川籍女红军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扬长征精

神,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却寥寥无几,专门写长征川籍女红军的图书更付阙如。”当时的王友平,开始将研究方向聚焦在这个伟大的群体上。

2015年初,王友平开始策划主编《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一书终于在2016年完成编撰出版。这部著作有30多位作者参与撰稿,其中杨绍明、何丽、谢亚旭等18位红军后代为该书供稿。

“研究和宣传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友平介绍,在参加长征的全国女红军中,川籍女红军独具特色,人数最多,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1935年春,跟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参加长征的女红

军约有8000人,其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有2000余人,她们绝大多数是四川人,最小的才八九岁,绝大部分在长征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此外,长征中的女红军,具有单独的军事建制,斗争特别英勇顽强。这支部队训练有素,在长征中历经千难万险,参加了强渡嘉陵江、攻打剑门关等许多激烈的战役战斗。这些女红军,大多三过草地并西征。

王友平说,在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川籍女红军以巴蜀儿女独特的性格、气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必胜的革命信心和坚毅顽强的斗争精神,同其他红军战士一道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红军长征史上的奇迹,值得大书特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静 刘柯辰

尘封近百年的墨砚 见证卢德铭青少年时期的革命理想

红色文物讲述百年党史

尚永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手掌大小、印有暗纹、上面布满白色的尘埃。这方毫不起眼的墨砚,是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的卢德铭烈士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使用过的“红色文物”。

“卢德铭从小聪颖好学、才华出众,很小就在内心深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近日,卢德铭侄孙、自贡市自流井区仲权镇卢德铭故居负责人卢国钊在卢德铭纪念馆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介绍,这方墨砚陪伴着卢德铭度过学生生涯,见证了他从一个饱读诗书的孩童,到成长为革命志士的历程。

“仲权镇过去叫双石铺,隶属于



伴随卢德铭烈士成长的墨砚。

宜宾,当时镇上有个‘鸡婆湾’,卢德铭6岁时就在这里念私塾。”卢国钊说,卢德铭家境殷实,父亲是当地盐号的账房先生,家里还有田地出租给

农户,所以有条件支撑起卢德铭的求学之路。

念私塾时,父母给卢德铭买了一个墨砚,便于他学习写字。

14岁时,卢德铭带着墨砚来到当时的宜宾白花高等小学堂就读。两年后,他考上了成都公学,这是一所当时在四川非常有名的学校。就这样,这方墨砚又跟随他来到成都公学。在成都公学读书时,卢德铭接触了许多进步书刊。同学们都去参加同乡会时,他则在寝室里读《新青年》《向导》《洪流》等进步书籍。

直到1924年2月,卢德铭持李筱亭(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秘书)的信函拜见孙中山,经孙中山面试、推荐,被黄埔军校破格录取,这方墨砚才被他留在了家里。

卢国钊今年57岁,从小在卢德铭故居长大。他说:“我10多岁时,有一

天放学回家,看见我父亲在整理东西,就问这是什么。父亲告诉我,‘这是你么公(卢德铭)用过的东西,很珍贵,要保管好’。”

据卢国钊回忆,当时,么公用过的墨砚和牛皮箱,都被放在柜子里。“后来,这两件遗物被我父亲送到了自贡烈士陵园。”他说。

卢国钊介绍,上世纪70年代,卢德铭牺牲的地方——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相关部门寻求帮助,“他们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找到了一张毕业照,但认不出哪个是卢德铭。”他说。

“经过我父亲、卢德铭未婚妻颜瑞琴、卢德铭的同学和战友辨认,最终确认了照片中的卢德铭。”卢国钊说,以前家中还有很多卢德铭寄回家的信件、使用过的书籍,但如今很多已不知去处,唯一还能找到的就是这方陪伴着少年卢德铭从孩童成长为革命志士的墨砚。